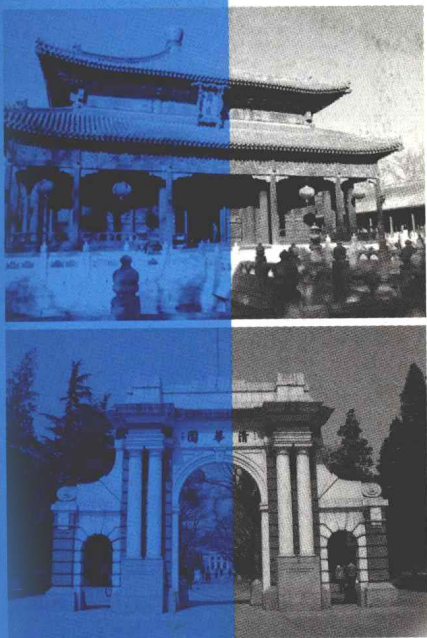


大象学术书坊



移植与转化

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

左玉河 著

太学兴盛

官学科举化

书院制度

书院与科举

西方大学宗旨

西方大学制度

大学研究院

现代学位制度

专业研究所

国家研究院

专业学会

图书馆

学术期刊

出版机构

大象出版社

大象学术书坊

移植与转化

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

左玉河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左玉河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7

(大象学术书坊)

ISBN 978-7-5347-4961-2

I. 移… II. 左… III. 学术机构—历史—中国 IV. G3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6097 号

责任编辑 张前进

责任校对 牛志远

封面设计 美霖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18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文化路 56 号金国商厦七楼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3944233

引 言

任何一个时代的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总是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限制,更无法超越特定的思维模式、思想框架、语言文字限制及相关制度化的规范。其中,制度化的规范,就是所谓学术体制。学术体制是学术研究正常运行的制度性建构,是一代学者学术思想得以产生的制度性保障。

中国传统学术有没有制度化的规范,即中国传统学术是否为体制化学术,乃为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是一种体制化学术,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制度化研究,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这种体制化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标志,就是现代大学、独立的专业研究所等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兴起。现代学术机构是构成现代中国学术体制最重要的元素。既然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创建的重要标志,那么便不能不令人追问: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古代中国有无类似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学术机构与古代学术机构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效仿西方近代学术体制而设立的中国现代学术机构有着怎样的中国特色?现代学术机构与现代学术研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现代学术机构对现代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及专业化

起了怎样的推进作用？这是考察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及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建构问题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果用现代学术眼光去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则会发现,古代中国确实没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学术体制,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机构和相应的学术中心。有人研究后认为:“如果制度架构给生产活动报酬,则将诞生企业以从事生产活动。西方知识生产组织的出现是以大学、科学学会(协会)、科学院为标志的,中国则潜伏在太学、国子监、书院等教育组织中。”^①古代中国的学术体制,显然不同于近代以来以大学和研究所以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而是以各级官学和各种书院为中心的古典式学术体制。学术研究的承担者,是士绅等所谓“读书人”;其基础在各种书院、各级官学(大学、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及民间私塾义学;其研究内容主要限定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官学、书院与科举制度相结合,构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古代中国学术体制。官学体制、书院制度及科举制度,构成了古代中国学术体制的主干;太学、国子监、各级官学及各种书院,便是古代中国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 and 学术中心。

所谓学术机构,是指学术研究成建制的单位。它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学术机构,也称学术研究机构,或学术研究机关,指独立的专业性研究院所;而广义的学术机构,除了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之外,还包括现代大学及其附设的研究院所,新式学会及其创办的研究所,近代图书馆及出版机构附设的学术编研机构,甚至包括政府部门附设的专门研究机关。笔者此处所谓“学术机构”,就是指广义的学术研究机构:除了包括现代大学及专业研究院所外,还包括新式学会、近代图书馆、出版机构及其附设的学术机构。换言之,本著所讨论的“学术机

^① 吴刚:《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中国教育知识史的比较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构”,除了现代大学及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外,还包括新式学会、近代图书馆、现代出版机构、学术杂志社等直接或间接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学术辅助机构。

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及其现代学术机构,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建立起来的:一是效仿西方近代学术研究体制,建立起现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并效法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机构,建立起中国现代大学、专业研究院所、新式学会及其他相关学术辅助机构。这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及其学术机构创建的主渠道,因而具有明显的“移植”特色。二是传统中国学术体制的创造性转化,若干现代性的合理因素被吸纳到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中,古代太学(国子监)、各级官学及各种书院,经过清末民初的书院“改制”,部分转化为新式学校,逐渐被现代大学体制及专业研究所制度所吸纳。通过对西方近代学术体制的“移植”和古代学术体制中若干现代因素的创造性“转化”两种渠道,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机构相继建立。传统的各种书院和各级官学也逐渐转化为追求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新式大学;依据近代西方理念创建的现代大学,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效法西方建立的中央研究院及其专业研究所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镇;与现代大学及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相配套的学术辅助机构——新式学会、近代图书馆、现代出版机构等也相继创建,从而使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日益走向职业化、专门化和建制化。

古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在各级官学及书院,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则移至新式大学及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晚清以后仿效日本、欧美而创建的新式大学得到迅猛发展。新式大学乃是迥异于传统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机构的新式学术机构,实为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专门学术组织。越来越多的学者被吸收到现代大学体制之中,大学教授构成传授知识与研究学问的主体。教授、院系、学科、图书馆、实验室、评议会、出版基金、学报及学术会议诸多元素所构成的大学制度,使

现代大学与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一道,赫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

严格说来,古代中国并不存在像西方近代那样有明确分工的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而近代意义上的专业研究院所体制,显然是清季以来从西方引入并逐渐完善的。在近代中国学术建制化过程中,中国相继从西方引入过两种学术研究机构模式:英国皇家学会制度及法国科学院制度。前者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后者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近代学会制度,实乃近代学术体制化的结果,对促进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组织化、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进程起了重大推进作用。但中国并没有英国皇家学会型学术制度生长的合适土壤,因为在缺乏民主基础和科学传统的古老国度,科学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获得自主发展而成为独立的社会建制,它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力量。因此,真正主导中国近代科学研究并发挥整合全国学术研究功能者,是像中央研究院那样的法国型国家研究院体制。法国国家研究院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创设为主要标志。

所谓国家研究院,主要指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正式创建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依靠强大的政府力量及其控制的庞大学术资源,较好地承担着整合全国学术资源、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并促进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的重任。中央研究院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职责,是因为中央研究院不仅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实体,而且在创建之初即被赋予联络、指导和评议全国学术研究的多重功能。它与国内很多公私立机关团体进行了海洋学、气象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多方面的合作研究,自觉地承担了指导、联络和奖励全国学术研究的职责。中央研究院不仅以具体的研究工作直接推动着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而且通过评议会及其年会制度,加强了全国学术界的联系,推动着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进程。尤其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设立后,在“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方针指导下,中央研究院充分发挥其国

家研究院的多方面功能,着力于推进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建设。

现代大学、新式学会及独立的专业研究所,需要有专业化的近代图书馆、新式学术期刊及著作出版机构与之相配套。近代图书馆、新式杂志社及现代出版机构,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辅助机构。近代图书馆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设施,为中国现代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障;现代体制化的学术研究难以离开近代图书馆,从而使近代图书馆不仅成为重要资料中心和阅览中心,而且成为学术信息集散中心,成为继新式学会、现代大学及专业研究院所之外的重要学术重镇。此外,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辅助机构,学术期刊、报纸等新式传媒为学者迅速将研究成果公布出来提供了极大便利,使学术成果交流便捷化成为现实。新式学术期刊的兴起,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不仅聚集了大批的专业学术研究者,而且建构了一个学术成果交流的重要平台。至于现代出版机构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推进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研究空间,为现代学术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现代学术机构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从而使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日趋体制化、建制化、专门化和职业化。一个学术研究体制化的新时代由此诞生。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太学体制及官学科举化	1
一、“学为官守”及学术下移	1
二、两汉太学之兴盛	3
三、官学体制的确立	8
四、科举引导官学	11
五、官学科举化	19
六、“官学一体化”格局	23
第二章 书院制度及其学术功能	29
一、不绝如缕的私学传统	29
二、新型书院制度的创立	31
三、书院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学术机构	34

四、书院的多种学术功能·····	36
五、书院官学化·····	42
六、书院与科举之勾连·····	45
第三章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 ·····	55
一、西方大学的演进·····	55
二、近代大学理念之阐述·····	58
三、研究高深学术的大学宗旨·····	64
四、西方大学制度的最初引入·····	69
五、美国大学模式的移植·····	75
六、大学学科及院系设置·····	86
七、蔡元培的北大学科改革·····	90
八、大学学科及院系的整顿·····	97
九、“教授治校”之制度设计 ·····	102
十、“教授治校”原则的维护 ·····	108
第四章 大学研究院及学位制度 ·····	120
一、大学创设研究所之设计 ·····	120
二、北大尝试创办研究所 ·····	122
三、北大国学门研究所的筹办 ·····	126
四、创办清华国学院 ·····	131
五、大学研究院之制度规划 ·····	139
六、大学研究院的普遍设置 ·····	145
七、现代学位制度的建立 ·····	154

第五章 创办独立的专业研究所	163
一、西方研究所体制与清末“通儒院”	163
二、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设想	167
三、创建专业研究所的呼吁	175
四、专业研究所的筹办	177
五、外国人在华创办研究所的刺激	183
六、掀起创办专业研究所的热潮	185
七、别具特色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192
八、专业研究所对学术研究之推进	195
 第六章 国家研究院及其评议体制	 199
一、两种科学体制化模式	199
二、国家研究院之酝酿	203
三、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创建	206
四、中央研究院的学术宗旨	217
五、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	222
六、中央研究院与其他学术机关的合作	227
七、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建立	233
八、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功能	241
 第七章 近代学会及其学术事业	 256
一、中国传统社团的特性	257
二、西方近代学会的引入	265
三、创建各种专业性学会	275
四、大学学术社团的普遍建立	284

五、中国科学社及其学术事业	288
第八章 图书馆及相关学术辅助机构	299
一、中西藏书特性的比较	299
二、西方图书馆制度的引入	307
三、专门图书馆的学术辅助功能	313
四、大学图书馆的创设	319
五、新式学术期刊的创办	326
六、大学学报的创办	337
七、出版机构成为学术文化之重镇	346
八、出版界对学术研究的推进	358
参考文献	367
后 记	385

第一章

太学体制及官学科举化

一、“学为官守”及学术下移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孟子·滕文公上》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表明殷周之时已有“校”、“序”、“庠”等类学校，用以教化人伦。这些学校均为官府所设，学术、知识亦被官府垄断。掌握学术文化乃为贵族特权，此即谓“学在官府”。既然学校由官府控制、学术为贵族垄断，必然导致“官学合一”、“官师合一”，职事之官同时兼职事之师。贾谊《新书·保傅》载：周成王幼时，“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又设少师、少傅、少保为副职，陪读太子。此种情况表明，官吏兼任教师职责在殷周时代甚为普遍。

殷周时代，学在官府，学为官守。《周礼》对各种职事之官的设定，实乃对“官学合一”体制的认定。《礼记·王制》云：“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对士之逐级选拔,乃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

“诸子起于王官”,既是对春秋时期私学来源之表述,亦为对春秋之前学术状况之合理表达。清人章学诚云:“自官师分而教法不合于一,学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师既分,则肄习惟资简策,道不著于器物,事不守于职业,其不同者二也。古学失所师承,六书九数,古人幼学皆已明习,而后世老师宿儒,专门名家,殚毕生精力求之,犹不能尽合于古,其不同者三也。”^①又云:“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于《诗》、《书》,或疏或密,途径不同,而同归于道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②

如此看来,“学在官府”而又“官学合一”,乃殷周时期学术体制的基本特征。这种学术体制,随着周室衰落、官制解体而日趋崩溃。不仅官府创办的各种学校业已衰败,而且作为周室各种职守之官吏亦流散各地,此乃孔子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官学因周室衰微而散落民间,遂形成私人讲学制度。

春秋时期私学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私家学派;二是私人教育团体。私学兴起与士阶层之形成密切相关。作为西周王官中之士,其官爵系世袭,当属贵族中之位卑者。王朝衰落后,出现了《孟子·告子下》中所谓“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之局面,士逐

① 章学诚:《博约下》,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② 章学诚:《博约下》,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渐沦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开始寻找新的生存途径。他们或为食客,或为读书人。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禄位在大夫;其失去官位后乃致力治学从教,变“王官之学”为“私家之学”,遂为私学之师。私学之兴起,弥补了官学衰微所带来的学术真空,并通过私人讲学及学术团体之活动,形成了学术研究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殷周时代的学术固然系官府之学,学术重心在王室;春秋时代散落于民间之学术,亦同样为官府之学,只是学术重心从王室下移到各地诸侯;学术研究主体已非昔日之王室官吏,而是新崛起的士阶层,由此出现“礼失而求于野”现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论语·子张》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士人承担着延续“文武之道”不坠之重任。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俨然成为东方学术中心。据刘向《别录》载:“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齐王不仅大兴土木、广建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①,而且为聚集此地的学者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依据其学术成就及资历授予其俸禄以资鼓励。当时来稷下学宫讲学的各派名士,包含了儒、道、法、阴阳诸家代表人物及其门徒“数百千人”。其中重要者有邹衍、孟子、田骈、慎到、伊文、接予、彭蒙、季真等人。他们受到齐王的优厚款待和恩宠,自由辩论,来去由己,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各地诸侯扶植的士阶层,遂成为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主要承担者。

二、两汉太学之兴盛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时期私学兴盛局面不复存在。秦始皇

^① 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禁止私学、“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乃是以官府之法律法规为教学内容，以各级官吏充任教师。以吏为师，实乃变相的“学在官府”。秦始皇以压制私学的强硬方式，使学术知识的中心重新上移，学术重心再次回归官府控制的各级官学。学术知识为官府所严密控制，遂难免使学术文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注解。

汉初虽仍承袭秦之吏师制度，但准许民间讲学。一些老儒聚徒讲学，私学再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文礼……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出现了汉初私学复兴的局面。专攻《诗经》、《穀梁传》的鲁人申公，“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其弟子申章昌还充任专掌儒家经学传授的学官博士，广收门徒，讲授学问。据《汉书》载：他“任长沙太傅，徒众尤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学。近人张正藩云：“中国的官学，直到汉代董仲舒请立太学，置博士弟子，而后才有正式的教育，也就是才有正式的官学。”^①

汉代中央官学谓“太学”，设于京城长安，选择德高博学之经师大儒担任教职，称“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主要研习儒家经典。其研习的经典，除《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外，尚研习《论语》、《孝经》等。“博士”各以其专精之一经教授弟子，学生则严守“师法”，精通一经，考试成绩优异者可授予官府官职。

地方官学多按行政区划设立，在郡国者称为学，在县、道、邑、侯者称为校，在乡者称为庠，在聚者称为序。其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主掌地方官学之讲授。中央太学设立后，郡国负有举荐博士弟子的职责，因而推动了郡国学校的发展。

汉武帝创立的这套官学制度，在当时得到迅速推行。以孔孟为正

^① 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与学术的关系》，《近卅年中国教育述评》，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425页。

宗之儒家经典,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从京师太学到地方郡国乡聚的学校庠序所构成的官学体制,则成为汉代学术传承及学者研习学问的主要机构。

汉代官学体制中的太学,堪称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太学以五经为研习的主要课程,官府以其为策士抡才之标准。博士制度的创立及完善,使太学成为汉代学术研究中心。“博士”作为一种官职,在战国时期业已出现。据司马迁《史记》载,战国时齐国置有博士官,掌管典籍、图书以备顾问。应劭《汉官仪》曰:“博士,秦官也;博者,博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王国维的《汉博士考》亦云:“博士之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汉兴,因秦制员至数十人。”汉代以降,“博士”成为学官之名:“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①据《汉书》载: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易》、《书》、《礼》、《春秋》各一家,《诗》有齐、鲁、韩三家,共为七家,其职责是以儒家“五经”教授生徒,复以其淹博之学识备官府策问。

西汉博士多由名流充任,以征拜或举荐方式录用;东汉博士则要经过考试严格选拔。据《汉书·成帝纪》载:“通《易》、《尚书》、《诗》、《礼》、《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师事某官,见授门徒五十人以上,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能达此要求者,无疑为当时之博学鸿儒。

博士官之设置,对经学研习促进甚大。太学博士分科授徒,各守师法。《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诸家;《礼》有大小戴;《春秋公羊传》则有严氏、颜氏。后《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亦立博士官。太学讲授经学,严格

^① 班固:《汉书·成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